

居住聚集还是行业聚集? ——同乡聚集与农民工创业研究

郭小弦 王建

摘要: 本文关注了市场化、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同乡聚集与创业问题。借助社会网络理论,本文区分了居住聚集与行业聚集两种同乡聚集形式,比较二者对农民工创业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借助全国范围的代表性数据,在克服样本选择性偏误的基础上,识别出两种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创业影响的异质效应,以及这些效应是如何随着市场化进程而动态演变的。研究有如下发现:首先,因日常交往的内卷化和信息传递的同质性,同乡之间的居住聚集并未增加农民工的创业优势,但基于职业相似性的业缘聚合形成的行业聚集,则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开展各类创业实践。其次,居住聚集对于农民工创业的消极影响在市场化进程中长期稳定存在,而行业聚集的积极作用则因创业过程与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动态变化。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行业聚集效应在规模较小、层次较低的自雇型创业中逐渐削弱,而在规模较大、层次较高的雇主型创业中逐步增强。这些经验发现,对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引导农民工高质量创业、激发农村创新活力、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关键词: 同乡聚集 农民工创业 市场化 异质效应

*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4NDJC224YBM)阶段性成果。

①作者简介:

郭小弦,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实证社会科学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网络研究、社会心态研究。

王建(通讯作者),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网络。邮箱:

jianwang@hznu.edu.cn。

Residential enclaves or industrial enclaves?

—A study of localistic enclaves and migrant worker entrepreneurship

Xiaoxian GUO Jian WANG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ocalistic enclave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Drawing on the social network theory, the paper distinguishes between two forms of localistic enclave, namely residential enclave and industrial enclave,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tial impacts of the two forms of enclave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With the help of nationwide representative data, the study identifies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the two types of localistic enclave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migrant workers and how these effects dynamically change with th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on the basis of overcoming the sample selectivity bias. The study ha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 residential enclave between the migrant workers from same hometown does not increase the entrepreneurial advantages of them, due to the internalization of daily interactions and the homogeneity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however, industry enclave formed by industry concentration based on occupational similarity is conducive for migrant workers to carry out all kinds of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s in the city. Secondly, the negative impact of residential enclave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migrant workers has existed steadily for a long time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whil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dustrial enclave has changed dynamically due to the changes of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and market environmen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marketization process, the industrial enclave effect gradually weakened in the smaller, lower-level self-employed entrepreneurship and gradually strengthened in the larger, higher-level employer-based entrepreneurship. These empirical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broadening farmers' income channels, guiding migrant workers'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stimulating rural innovation, and realiz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Localistic enclave; Entrepreneurship of migrant workers; Marketization; Heterogeneous effect

一、问题的提出

创新创业是促进新时代中国经济腾飞的引擎，激发着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农民工作为推动农村脱贫致富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力军，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力，是乡村振兴战略中开展创业实践的中坚力量。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寻觅商机。农民工怎样借助于市场化路径充分地融入“新型城镇化”进程，是当前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农民工的创业机遇与社会网络密切相关。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形成的先赋性网络在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一方面，在进入城市之初，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家族、亲友或同乡提供的就业信息和流动资源，进入最初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李培林，1996；王春光，2000）；另一方面，在进入城市后，农民工更多是以同乡关系为基础来拓展新的社会网络，并以此获取人际支持和谋求职业发展（刘林平，2001）。在居住安排上，为了快速适应城市生活以及最大程度地规避流动所带来的风险，农民工往往与同乡聚居在一起，形成具有家乡地域特色的生活社区（项飙，2000）。在就业生计上，农民工也常依托于家乡亲缘网络形成具有“同乡同业”特征的职业团体，以同乡关系建构具有分工协作基础的商业合作网络（郑莉，2014）。由此，同乡网络也随着农民工的迁移和就业过程渗透到了城市的经济活动之中。有学者将农村迁移者这种建立在同乡认同之上的频繁互动、在生活和就业上相簇而居的城市生存策略称之为“同乡聚集”（张春泥、谢宇，2013）。

日常生活状态下的同乡聚集，不仅为迁移者提供社会支持和群体团

结，还为移民雇主和自雇者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受到人力资本短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双重制约，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过程中常常遭受歧视和不公待遇。而农民工同乡之间的聚集不仅能够有效快速传递工作信息，而且还能以组织化的方式在同乡密集的领域中形成相对公平的就业环境。因而，长期以来同乡网络被视为影响农民工权益状况的重要因素（魏万青、高伟，2019），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大量研究表明，同乡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是农民工规避创业风险的重要机制，对于共享创业经验、增进信息沟通、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协同合作、增加创业者心理安全感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董静、赵策，2019；胡金焱、张博，2014；柳建坤等，2020；汪国华，2019；叶静怡、王琼，2013；庄晋财等，2014）。可以说，同乡之间的密切交往与簇拥聚集为农民工创业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但是，这些研究忽略了市场化进程中同乡聚集作用的差异性以及动态演变过程。这可能与两个社会事实有关：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过程中乡土观念的不断卷入以及人际网络在现代都市的再造，具有先赋特质的同乡网络可能产生分化。这意味着，农民工借助同乡网络获取资源的途径亦可能会因聚集形态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对同乡聚集的依赖程度也可能会有所降低。市场化进程的增进意味着资源流动与配置的规范性在逐步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削弱社会网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效力（张顺、程诚，2012），继而抑制同乡网络在资源共享与信息传递方面的媒介作用。市场转型中资源配置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力量的共存与分化，诱发了我们新的思考：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城市中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纽带形成的同乡聚集，将会以何种形式影响农民工的创业机遇？

二、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

同乡聚集研究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国际移民研究中的分割同化理论(狄金华、周敏, 2016)。该理论认为, 移民进入迁入地后, 除了可能向上融入中产社会或向下融入底层社会之外, 还可能以族群组织化聚集的方式来抵御在主流社会遭遇的重重困难 (Portes & Zhou, 1993; Zhou, 1997)。相同族群的聚集有利于迁移者克服制度障碍和人力资本短板, 开展新的职业活动并顺利融入当地生活 (Xie & Gough, 2011)。在本质上, 族群聚集是迁移者们以相似的文化特质、相近的生活方式以及相同的经济活动, 形成边界清晰且带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分隔型社区”(狄金华、周敏, 2016)。在中国, 同一原籍的农民工更容易结识交往、相互认同和团结聚集。尤其是, 对于经济地位较差和新来城市的务工者, 他们因社会经济的劣势地位以及文化适应的边缘处境, 更加倾向选择与同乡亲友簇拥聚居 (刘启超, 2016)。这种聚集不仅能够让迁移者在陌生文化中与族群成员保持步调一致, 还能够形成相对稳固的社会支持网络, 从而有效应对流动带来的多种风险和不确定性 (陈瑛, 2019)。

作为一种复杂的经济活动, 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过程充满着巨大风险。创业是从机会发现与识别、资源优化与整合再到价值转化、资本增值和效益扩散的商业过程 (斯晓夫等, 2016)。创业者的核心任务之一, 便是利用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能力降低外部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农民工而言, 要想成功创业则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能够从打工的外部环境中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 并牢牢抓住契机落实创业计划; 二是能够在实施创业活动后不断协调各类资源, 充分利用已有条件来运营管理,

并努力提升创业质量与绩效（庄晋财等，2014）。由于受到人力资本短板与制度环境的双重束缚，农民工在务工地开展创业活动面临诸多困难。一方面，大部分农民工文化水平偏低、创业经验匮乏、认知能力不高，仅仅依靠自己难以发现合适且有价值的商业机会，而在务工过程中积累的资本、知识以及技术等资源也远远没有达到开展创业所需的基本条件（庄晋财等，2014）；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创业项目往往具有资本回报率低、规模小、风险大等特点，很难满足正规金融机构所设定的放贷条件，而缺乏正式金融渠道的支持无疑会增加农民工创业失败的风险（柳建坤，2020）。由于受自身知识储备和财力支持的限制，农民工能否有效动员社会网络并获得技术支持与融资机会，就成为了他们创业面临的首要难题。

同乡聚集以及由此维系和拓展的社会网络是农民工获取创业支持、克服创业困难的重要渠道（刘小童等，2018；汪国华，2019）。之所以同乡聚集能够对农民工创业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其原因在于创业者能够凭借同乡之间的人际互动获得物质资本、技术经验、重要信息以及情感支持等多元化的创业资源（李颖晖，2020；王文彬、赵延东，2012）。在创业的不同阶段，社会网络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创业准备阶段，农民工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主要依靠同乡之间商业信息的传递和经验分享来实现；在创业起步阶段，项目启动资金大多是通过家人、亲戚和同乡等非正式融资渠道来筹集；在创业发展阶段，创业的合作伙伴和客户资源也大都来自于同乡亲友的介绍，借助同乡关系来扩大经营范围与合作网络（郑莉，2014）；在创业面临瓶颈时，同乡关系更是农民工动员网络资源、寻求外部救援的第一选择。从资源嵌入的角度来看，同乡关系的创业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创业市场中同乡关系可以

充当经济主体多方沟通的桥梁，能够规避信息传播的不对称缺陷，有利于创业者把握市场方向、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从而占领创业先机（边燕杰、张文宏，2001）；第二，农民工能够在同乡亲友的帮衬之下进入相似度极高的行业，大家相互扶持、彼此模仿，通过同乡间的分工协作形成相对优势的行业竞争环境（郑莉，2014）；第三，在正式制度规范缺位的条件下，同乡关系能够充当摄取人情照顾和权力影响的手段，从而打通资源获取的非正式通道（Bian，1997），为行动者带来创业所需的关键性资源；第四，基于情感信任建立的同乡支持网络不仅能够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过程中亟需的物质支持，也能够为创业者提供持续的情感支持与社会信任（赵佳佳等，2020）。这种情感支持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资本，能够为创业者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使其以积极乐观、从容冷静的心态面对创业中出现的各类风险与挑战（董静、赵策，2019）。

同乡聚集以及由此缔结的关系网络并非总是能够带来经济红利。同乡关系能够在农民工创业选择及创业表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创业者挖掘商机、维持经营、化解风险、提高收益行之有效的非制度化手段。但也有研究给出了不同的发现。一方面，在族群聚集的组织中，雇主可能会利用亲缘和地缘关系的便利剥削同族劳工（Bonacich，1987）。同乡之间的熟人网络可能会成为彼此进行“合法”欺瞒和压榨的隐蔽手段，这种“杀熟”行为将会破坏同乡之间的信任纽带，从而不利于创业绩效的提升（谭同学，2012）。另一方面，从社会融合的角度看，同乡关系虽为农民工快速适应城市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但也束缚他们形成新的城市网络（陈黎，2010）。从网络结构的角度来看，同乡关系表征的是一种紧密程度高、异质性低、强关系多的熟人网络（王建，2018）。同

乡之间交往的内卷化和熟人圈子的封闭性,使得农民工与本地居民形成交往隔离,从而脱离于城市主流群体之外(聂伟、风笑天,2013)。有研究表明,通过资源优势、居住成本分摊以及人力资本补偿,同乡聚集虽有助于少数民族地区流动者的收入增长,但不利于他们社会地位的获得(陈瑛,2019)。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因同乡聚集而形成的区隔型融入并不利于农民工适应城市。同乡之间的同质性网络将阻碍农民工在更大范围内获取创业外部资源,而同乡之间的相互串联、盲目攀比和恶性竞争甚至可能会对整个创业进程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汪国华,2019)。

尽管上述同乡聚集的经济效应在农民工流动和国际移民研究领域被反复论证,但在这些争论忽略了同乡聚集效应的变异性。创业过程始终嵌入于制度情境之中,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创业机遇的影响受制于市场环境、创业过程以及聚集状态的多方调节。在制度主义看来,随着市场的不断深化和正式制度的不断建立,成熟的法律、规则将逐渐取代社会网络的非制度化作用,社会网络的经济价值与资源配置效用也会随之降低(Guthrie,1998)。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市场发展与农民的社会网络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够降低农民对社会网络的依赖程度(陆铭等,2010;王晶,2013;张爽等,2007)。而在城市地区,随着市场化程度提升,农民工通过社会网络形成的同乡聚集趋势也有所下降(王春超、王聪,2016)。随着国家对“双创”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及金融体制的逐渐成熟,农民工也可以通过正式渠道获得融资机会,这大大增加了他们在市场体系创业的可能性(胡金焱等,2014)。此外,亲缘和地缘关系与市场的互嵌,能够激发创业中先赋网络更强的生命力(谭同学,2012)。同乡之间因职业相似性聚集而成的行业团体,

是农民工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组成的生产系统，是以亲缘与地缘基础在组织层面展开的商业合作网络。这种以亲缘和地缘建立的业缘网络，能够在市场机制完备和资源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让行业内部信息和创业资源最大化共享，从而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并提高创业绩效（谭同学，2012）。因此，同乡聚集所产生的创业红利可能会因制度变迁而有所改变。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实证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此次调查是由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设计实施的一项专门针对15周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全国性大型社会调查。该调查采用了分层、多阶段以及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相结合的抽样方法，样本涵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流动人口。2017年的调查总共回收有效问卷169989份。参考国家统计局《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①中的定义，本文将农民工样本界定为年龄15~65周岁具有农业户籍、在流入地处于就业状态、从事除精英职业（如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业中的公务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以外的农村流动人口。在排除不符合上述条件以及缺失值样本之后，共获得111738个有效分析样本。

^① 参见 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4/t20230427_1939124.html。

（二）变量测量与描述性统计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外出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创业机会。此次调查向受访者询问了就业身份与工作状态，包括了有固定雇主的雇员、无固定雇主的雇员（零工、散工等）、雇主、自营劳动者和其他五种状态。为了能够准确反映农民工的创业规模与创业层次，本文根据上述就业身份识别出“雇主”和“自雇”两种创业状态。前者是指通过雇佣他人并向其定期支付薪资以获取被雇佣者劳动价值的创业者；后者是指劳动过程中不雇佣他人的自雇人士，包括了各类没有雇佣任何劳动者的个体店主、自由职业者、零散摊贩、无派遣单位的保姆、自营司机以及手工工匠等。二者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劳动关系和生产方式上，更体现于资本投入、生产规模、经营绩效等创业质量的多个方面。一般而言，“雇主型”创业在资本投入、生产规模、经营绩效、资金周转、风险规避等方面要明显优于“自雇型”创业。在操作上，我们将选择“自营劳动者”选项的受访者划分为“自雇型”创业（=1）；将“雇主”选项的受访者划分为“雇主型”创业（=2）；将选择其他选项的受访者划分为未创业者（=0）。在此次调查中，有45.29%的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选择了自主创业。其中，仅有6.67%的农民工成为了雇主创业者，而大约有38.62%的农民工成为了自雇创业者。这些从事自营创业的劳动者，绝大多数分布在批发零售、餐饮住宿、交通运输、文体印刷、家电维修等服务行业。这说明，大多数农民工外出创业停留在较低层次上，仅仅有较少部分农民工开展了较高层次的创业活动。

2. 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同乡聚集。有研究表明，为了快速适应城市生活以及最大化规避流动风险，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常与关系密切的同乡亲友聚居，形成具有家乡地域特色的社区（刘启超，2020；项飙，2000）。此外，农民工也因同乡的“传帮带”在职业选择上具有较强的相似性，继而形成以同乡网络为轴心的行业分工体系（谭同学，2012；郑莉，2014）。综合以上，农民工进入流入地后常常以“居住聚集”和“行业聚集”两种方式与同乡保持密切联系。前者是同乡之间、私人的日常交往与频繁互动，在居住空间上形成的紧密联系；后者是同乡之间、因职业相似性聚合形成的职业团体，是从事相同行业的创业者通过价值链和供应链网络，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组成的生产系统，反映的是同乡之间在组织层面展开的商业合作与业缘联系。

居住聚集的测量主要从同乡交往紧密程度与地缘聚集程度两个角度展开。在同乡交往方面，此次调查向受访者询问了“除顾客和亲属以外，业余时间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如果被访者选择与同乡交往最多则标记为1，否则标记为0。在地缘聚集方面，我们借鉴以往研究（王春超、王聪，2016）中的区位商指数来反映某一户籍地的农民工在特定城市分布的集中程度。在实际研究中，为了能够综合反映同乡交往与地缘聚集的双重特征，本文运用潜类别分析（Latent Category Analysis）方法，根据这两个外显变量的分布情况来识别出居住聚集程度较高的群体。行业聚集的测量则从同乡商业组织的角度进行间接刻画。此次调查向受访者询问了“自2016年以来是否参与过同乡商会组织的活动”，如果被访者选择参与过则标记为1，否则标记为0。

此外,为了能够进一步研究同乡聚集效应如何随着市场化进程变化,本文引入市场化的概念。市场化程度的测量主要是采用樊纲和王小鲁测算的2016年度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区市场化指数。2016年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为浙江省,其市场化指数高达9.97;市场化程度最低地区的为西藏,其市场化指数仅为1.02。

3. 控制变量

除了上述变量以外,本文还包括被访者性别、年龄及二次项、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务工年限、流动方式、更换城市数量、本地融合程度、流动距离、流入流出地特征以及产业类型等控制变量。表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操作说明和描述性统计情况。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N=111738)

| 变量名称 | 均值 / 百分比 | 标准差 | 变量名称 | 均值 / 百分比 | 标准差 |
|-----------|----------|------|--------|----------|------|
| 创业类型 | | | 本地融合程度 | 24.62 | 3.28 |
| 未创业 | 54.71% | — | 流动距离 | | |
| 雇主型创业 | 38.62% | — | 跨县流动 | 17.44% | — |
| 自雇型创业 | 6.67% | — | 跨市流动 | 31.94% | — |
| 同乡聚集 | | | 跨省流动 | 50.62% | — |
| 居住聚集(高=1) | 0.36 | 0.48 | 流出地区 | | |
| 行业聚集(是=1) | 0.25 | 0.43 | 西部 | 35.39% | — |
| 市场化 | 7.17 | 2.15 | 中部 | 41.64% | — |
| 性别(男=1) | 0.57 | 0.49 | 东部 | 22.96% | — |
| 年龄 | 36.27 | 9.81 | 务工城市级别 | | — |

① 数据来源: 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bookdetail?SiteID=14&ID=12896275。

| | | | | | |
|----------------------|--------|------|------|--------|---|
| 年龄 ² /100 | 14.11 | 7.51 | 农村 | 29.44% | — |
| 教育程度 | | | 小城市 | 16.92% | — |
| 小学及以下 | 68.25% | — | 中等城市 | 20.03% | — |
| 高中 | 21.69% | — | 大城市 | 29.07% | — |
| 大专及以上 | 10.06% | — | 特大城市 | 4.54% | — |
| 婚姻状态（在婚） | 0.83 | 0.38 | 产业类型 | | |
| 外出方式（结伴=1） | 0.59 | 0.49 | 第一产业 | 2.68% | — |
| 务工年限 | 6.41 | 6.05 | 第二产业 | 25.74% | — |
| 更换城市数量 | 2.08 | 2.03 | 第三产业 | 71.58% | — |

（三）研究方法与策略

农民工在流入地是否同乡聚集是一个自选择过程（魏万青，2016；Zhang & Xie，2013）。为了尽可能降低估计偏差，本文使用倾向值匹配来处理样本选择问题。在本质上，倾向值是在给定观测协变量的情况下，观测个案被分配到干预组（而非控制组）的条件概率（Guo & Fraser，2014）。由于这个概率是通过综合干预组（同乡聚集）和控制组（非同乡聚集）之间的差异而估计得来，因而根据倾向值对干预组和控制组成员进行样本匹配，能够有效地消除两组样本之间的选择性偏差，继而能够更为准确地评估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创业影响的平均干预效应。在匹配策略上，首先采用二分类Logit模型对农民工是否与同乡聚集的可能性（倾向值）进行估计，并根据得到的倾向值采用贪婪匹配策略中的卡尺匹配（Caliper Matching）方法对样本进行平衡处理。根据以往建议，卡尺匹配的容忍度设定为倾向值标准差的四分之一较为合适（Guo & Fraser，2014）。通过此方法可在获得倾向值之后创建一个新的样本，使得每个成员具有大致相同的可能性被分配至干预组和控制组，从而获得一个类

似于随机化实验中干预组和控制组的一对一平衡样本。本文的因变量是一个多分类变量，因此合理的统计方法应该采用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对倾向值匹配后的平衡样本进行建模。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环境的巨大地区差异，农民工的创业决策也与外部经济环境的瞬息变化密切相关。同时，考虑检验市场化进程中同乡聚集效应的变迁趋势，本文运用两层次（省份和个体）的随机截距模型和随机系数模型来捕捉同乡聚集作用如何随着市场化进程而动态变化。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两类同乡聚集：倾向值估计与样本平衡性检验

为了估计居住聚集和行业聚集的倾向值，本文分别以两类同乡聚集为因变量各自建立 Logit 模型。纳入两组 Logit 模型中的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及二次项）、教育年限、婚姻状态、外出方式、流动距离、务工年限、流动城市的数量、本地融合程度、流出地区、流入城市以及所属的产业类别。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可知，农民工与同乡的聚集状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在人力资本方面，农民工的教育程度越高、务工年限越长，越可能与同乡行业聚集、建立较为正式的业缘联系，而发生居住聚集的可能性越小。其次，在社会融合方面，农民工在本地融合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与同乡形成行业聚集，但这种情况并不利于同乡之间形成居住聚集。再次，在流动方式方面，相比于独自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那些结伴而行的农民工更需要通过日常化的私人联系获取非正式的人际支持，但并不利于他们

从同乡商业组织中获取正式的支持。最后，在流动过程方面，流动的空间距离、流动的城市数量、流出地区、流入城市级别以及所在产业，都是影响农民工能否与同乡聚集的重要因素。总的来说，农民工在务工地能否与同乡聚集，并非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过程，而是受制于自身人力资本条件、流入地的融合程度、流动方式、流动过程以及产业特征等多种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两种聚集模式的对比告诉我们，农民工居住聚集与行业聚集的形成似乎有着不同的逻辑：前者更多是人力资本较差、城市融入状况不佳的农民工以私人联系获取日常化同乡支持的重要手段，是市场能力赢弱者的联合；后者更多是人力资本较高、城市融入状况较好的农民工通过同乡网络形成商业合作的桥梁，是市场能力较强者的结盟。因而，对于不同类型的同乡聚集加以区分是十分必要的。从方法的角度看，同乡聚集过程中的选择性问题的不可忽视，有必要引入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对样本进行平衡性处理。

表 2 居住聚集与行业聚集倾向值估计的 Logit 模型

| 变量名称 | 模型 1 | | 模型 2 | |
|----------------------|-----------|---------|-----------|---------|
| | 居住聚集 | | 行业聚集 | |
| 性别（男=1） | 0.194*** | (0.013) | 0.336*** | (0.015) |
| 年龄 | 0.014*** | (0.005) | 0.084*** | (0.006) |
| 年龄 ² /100 | -0.036*** | (0.006) | -0.127*** | (0.008) |
| 教育程度（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 | | | |
| 高中 | -0.098*** | (0.016) | 0.161*** | (0.018) |
| 大专及以上 | -0.502*** | (0.024) | 0.012 | (0.025) |
| 婚姻状态（在婚=1） | 0.094*** | (0.020) | 0.118*** | (0.023) |
| 外出方式（结伴=1） | 0.015 | (0.014) | -0.020 | (0.015) |

| | | | | |
|----------------|-----------|---------|-----------|---------|
| 流动距离（参照组：跨县流动） | | | | |
| 跨市流动 | 0.159*** | (0.021) | 0.112*** | (0.022) |
| 跨省流动 | 0.559*** | (0.019) | 0.353*** | (0.021) |
| 务工年限 | -0.013*** | (0.001) | 0.005*** | (0.001) |
| 更换城市数量 | 0.035*** | (0.003) | 0.043*** | (0.003) |
| 本地融合程度 | -0.042*** | (0.002) | 0.025*** | (0.002) |
| 流出地区（参照组：西部） | | | | |
| 中部 | -0.038*** | (0.015) | 0.023 | (0.016) |
| 东部 | 0.023 | (0.017) | 0.076*** | (0.019) |
| 务工城市级别（参照组：农村） | | | | |
| 小城市 | -0.308*** | (0.020) | 0.164*** | (0.022) |
| 中等城市 | -0.142*** | (0.019) | 0.166*** | (0.021) |
| 大城市 | -0.071*** | (0.017) | 0.175*** | (0.019) |
| 特大城市 | -0.045 | (0.032) | 0.078** | (0.036) |
| 产业类型（参照组：第一产业） | | | | |
| 第二产业 | -0.050 | (0.041) | 0.236*** | (0.050) |
| 第三产业 | -0.244*** | (0.040) | 0.224*** | (0.049) |
| 常数项 | 0.329*** | (0.108) | -3.987*** | (0.127) |
| <i>N</i> | 111738 | | 111738 | |
| pseudo R^2 | 0.030 | | 0.018 | |

注：（1）* $p < 0.1$ ，** $p < 0.05$ ，*** $p < 0.01$ ；（2）括号内为标准误。

为了知晓倾向值匹配在多大程度上削减了选择性偏差，我们对匹配前后的各组样本进行了平衡性检验。下图 1 呈现的是倾向值匹配前后各协变量在干预组和控制组之间标准化偏差的百分比。这一指标能够准确反映出各变量匹配前与匹配后在两组样本上的差异化分布情况（陈强，2014）。图 1（a）反映的是居住聚集的匹配情况。对于居住聚集程度较高和较低的两组农民工，在倾向值匹配之前，他们除了在外出方式、流出地区和婚姻状态三个变量上没有显著差别以外，在其余变量均存在着

本质差别；而在倾向值匹配之后所有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都大幅缩小（匹配后所有系数均在 0 附近）。与之类似，图 1（b）反映了行业聚集的匹配情况。对于有行业聚集与无行业聚集的两类农民工，在匹配之前，他们在性别、年龄（及二次项）、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流动方式、更换城市的数量、本地融合程度、流动距离、流出地区以及务工城市级别等方面均存在着本质差别；而在倾向值匹配以后，两组样本仅在更换城市的数量上略微存在差别。由此可见，倾向值匹配确实有效地消除了农民工同乡聚集的选择性偏误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干预组与控制组样本之间的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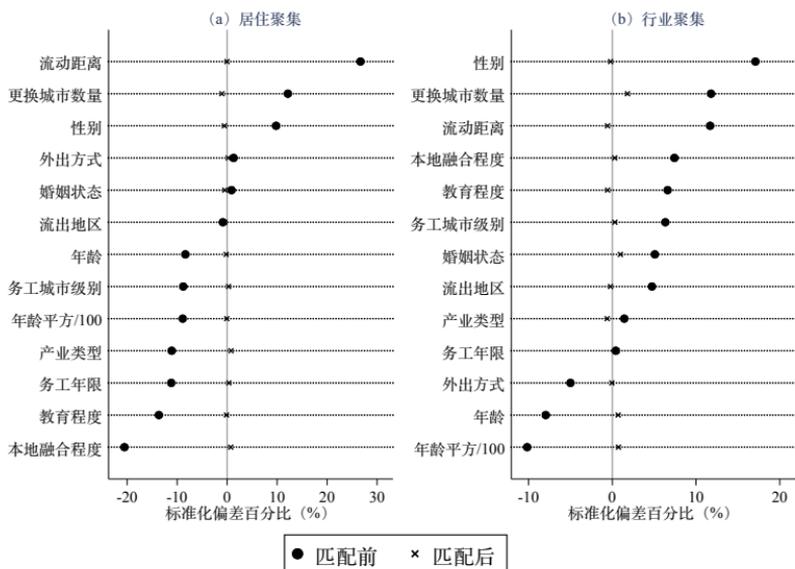


图 1 倾向值匹配后的平衡性检验

（二）两类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两层次多分类逻辑回归

为了能够明晰同乡聚集如何影响农民工创业，我们在倾向值匹配之后，采用两层次的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估计了两种不同状态的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创业情况的影响。下表3呈现的是农民工创业影响因素的两层次随机截距模型，它是在控制地区（省份）结构性差异的基础上，各类因素对因变量的直接影响。

居住聚集和行业聚集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别。模型1考察了居住聚集对农民工创业机会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居住聚集对自雇创业和雇主创业影响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94和-0.143，且两者均通过了统计检验。这就是说，同乡在居住空间上的聚集并不能为农民工创业提供便利条件，相反，同乡之间交往的内卷化和封闭性使得网络的同质性更高，所带来的信息与资源无法增加农民工的创业优势。相比于自主创业，同乡居住聚集带来的优势更多体现于农民工的受雇过程。模型2考察了行业聚集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同乡行业聚集对自雇创业和雇主创业影响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69和0.368，且两者也均通过了统计检验。这意味着，无论是规模较小、层次较低的自雇创业，还是规模较大、层次较高的雇主创业，同乡之间的行业聚集都能够显著增加农民工的创业优势。可见，因职业相似性业缘聚合形成的商业组织与合作网络，在农民工进入市场化路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模型2系数的初步比较来看，行业聚集所带来的创业优势更多地受益于雇主（ $0.069 < 0.368$ ）。这表明，基于同乡组织或商业合作形成的行业聚集网络更有利于农民工开办较具规模、

层次较高的创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与同乡亲友、生意伙伴的组织化聚集能够获得企业管理、发展规划等方面的经验和信息，有利于农民工创业者提高管理水平和制定合理的经营战略，从而提升创业绩效。另外，在两组模型中，市场化对各类创业活动的影响都负向显著。这一结果的含义是在市场化愈发达的省份或地区，农民工自主开展创业实践的可能性越小。我们可以推测，在那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能够为农民工提供充分的受雇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少会选择自主创业。

表 3 农民工创业影响因素的两层次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随机截距）

| 变量名称 | 模型 1 | | 模型 2 | |
|----------------------|-----------|-----------|-----------|-----------|
| | 自雇 vs 未创业 | 雇主 vs 未创业 | 自雇 vs 未创业 | 雇主 vs 未创业 |
| 居住聚集（是=1） | -0.094*** | -0.143*** | — | — |
| 行业聚集（是=1） | — | — | 0.069*** | 0.368*** |
| 市场化 | -0.276*** | -0.244*** | -0.269*** | -0.217*** |
| 性别（男=1） | 0.105*** | 0.279*** | 0.134*** | 0.329*** |
| 年龄 | 0.101*** | 0.222*** | 0.098*** | 0.213*** |
| 年龄 ² /100 | -0.122*** | -0.301*** | -0.115*** | -0.284*** |
| 教育程度（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 | | | |
| 高中 | -0.218*** | 0.171*** | -0.272*** | 0.182*** |
| 大专及以上 | -0.766*** | 0.071 | -0.810*** | 0.132** |
| 婚姻状态（在婚=1） | 1.029*** | 0.970*** | 1.020*** | 0.913*** |
| 外出方式（结伴=1） | 0.221*** | -0.039 | 0.220*** | -0.059* |
| 流动距离（参照组：跨县流动） | | | | |
| 跨市流动 | 0.110*** | -0.002 | 0.050 | 0.001 |
| 跨省流动 | 0.506*** | 0.492*** | 0.459*** | 0.494*** |
| 务工年限 | 0.031*** | 0.043*** | 0.030*** | 0.048*** |
| 更换城市数量 | 0.010** | 0.038*** | 0.005 | 0.031*** |

| | | | | |
|-------------------------|-----------|-----------|-----------|-----------|
| 本地融合程度 | 0.014*** | 0.049*** | 0.012*** | 0.057*** |
| 流出地区 (参照组: 西部) | | | | |
| 中部 | 0.854*** | 0.796*** | 0.850*** | 0.690*** |
| 东部 | 1.252*** | 1.332*** | 1.248*** | 1.284*** |
| 务工城市级别 (参照组: 农村) | | | | |
| 小城市 | 0.400*** | 0.733*** | 0.408*** | 0.738*** |
| 中等城市 | 0.185*** | 0.591*** | 0.174*** | 0.581*** |
| 大城市 | 0.133*** | 0.587*** | 0.106*** | 0.540*** |
| 特大城市 | -0.126** | 0.642*** | -0.214*** | 0.636*** |
| 产业类型 (参照组: 第一产业) | | | | |
| 第二产业 | -1.377*** | -0.402*** | -1.377*** | -0.526*** |
| 第三产业 | -0.441*** | 0.134 | -0.425*** | -0.027 |
| 常数项 | -2.265*** | -8.159*** | -2.256*** | -8.411*** |
| <i>Var</i> (截距) | 0.358*** | 0.220*** | 0.363*** | 0.211*** |
| <i>Cov</i> (截距 1, 截距 2) | 0.246*** | | 0.244*** | |
| 组数量 | 32 | | 32 | |
| 样本量 | 80188 | | 55892 | |

注: (1) * $p < 0.1$, ** $p < 0.05$, *** $p < 0.01$; (2) 为节省篇幅, 标准误未报告。

为了确保上述结果的稳定与可靠性, 本文除了使用卡尺匹配之外, 还运用了其他匹配方式估算同乡聚集的平均干预效应。如表 4 所示, 无论是采用最小近邻匹配、卡尺内最小近邻匹配、局部线性匹配, 还是采用自助抽样法 (bootstrapping) 迭代 500 次的样条匹配, 估计结果均与上文发现一致。虽然在不同匹配方法之下 ATE 的大小略有差异, 但都证实了同乡聚集能够对农民工的创业机遇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而言, 居住聚集与行业聚集的作用相反, 前者明显降低了农民工创业的可能性, 而后者显著提高了农民工创业的机率。

表 4 稳健性检验：倾向值匹配后同乡聚集的平均干预效应 (ATE)

| 匹配方法 | 居住聚集 | | 行业聚集 | |
|------------------|-----------|-----------|----------|----------|
| | 自雇创业 | 雇主创业 | 自雇创业 | 雇主创业 |
| 最小邻近匹配 (1: 1) | -0.039*** | -0.023*** | 0.029*** | 0.064*** |
| 最小邻近匹配 (1: 2) | -0.017*** | -0.013*** | 0.021*** | 0.033*** |
| 卡尺内最小邻近匹配 (1: 1) | -0.029*** | -0.017*** | 0.023*** | 0.045*** |
| 卡尺内最小邻近匹配 (1: 2) | -0.017*** | -0.013*** | 0.021*** | 0.033*** |
| 局部线性匹配 | -0.018*** | -0.012*** | 0.017*** | 0.034*** |
| 样条匹配 | -0.018*** | -0.012*** | 0.017*** | 0.034*** |

注：(1)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三) 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市场化与同乡聚集的交互效应

上述分析表明，同乡聚集能够对农民工创业产生重要影响，并且这种作用会因同乡聚集状态的不同以创业过程存在差异。那么，面对市场化进程的结构转变，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又将如何变化？为了回答这一疑问，我们在倾向值匹配之后，通过使用两层次的随机系数模型来捕捉两类同乡聚集与市场化之间的交互效应，以此来检验农民工创业过程中同乡聚集的作用如何随市场化进程变化（结果如下表 5）。

首先，表 5 中的模型 1 考察了市场化进程中居住聚集作用的变化趋势。根据结果显示，无论是对于自雇创业还是雇主创业，居住聚集与市场化之间的交互项均不显著。这意味着，居住聚集对农民工创业的负向影响始终存在，其作用并不会因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而增减变动。其次，模型 2 考察了市场化进程中行业聚集作用的变化趋势。对于自雇型创业而言，行业聚集与市场化的交互项负向显著；而对于雇主型创业而言，行业聚

集与市场化的交互项正向显著。这意味着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行业聚集对农民工开展规模较小、层次较低创业的作用在逐渐削弱,而对农民工开展规模较大、层次较高创业的作用在逐步加强。概言之,居住聚集对于农民工创业的消极作用能够在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始终存在、保持不变,但行业聚集的积极作用因创业过程与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动态演变,并且这种变化趋势也会因创业层次的不同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异质性。

表 5 农民工创业影响因素的两层次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 (随机系数)

| 变量名称 | 模型 1 | | 模型 2 | |
|------------|-----------|-----------|-----------|-----------|
| | 自雇 vs 未创业 | 雇主 vs 未创业 | 自雇 vs 未创业 | 雇主 vs 未创业 |
| 居住聚集 | -0.099* | -0.194* | — | — |
| 行业聚集 | — | — | 0.315*** | 0.190** |
| 市场化 | -0.276*** | -0.247*** | -0.253*** | -0.239*** |
| 居住聚集 × 市场化 | 0.001 | 0.007 | — | — |
| 行业聚集 × 市场化 | — | — | -0.037*** | 0.022* |
| 控制变量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注: (1) * $p < 0.1$, ** $p < 0.05$, *** $p < 0.01$; (2) 本表控制变量与表 3 中相同,为节省篇幅未报告控制变量与模型随机效应的相关统计量,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为便于理解上述结果,我们根据表 5 的交互模型绘制了市场化进程中同乡聚集效应的变化趋势图(如图 2)。我们以非同乡聚集的农民工作为参照,来比较两类同乡聚集对创业影响的相对优势。如前文分析一致,居住聚集对农民工创业影响始终为负向(始终在 0 以下),并且这种消极作用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行业聚集的效应在不同的创业类型中表现出明显差异。随着市场化进程的

不断深入，行业聚集的相对优势在自雇型创业中逐渐削弱，而在雇主型创业中逐步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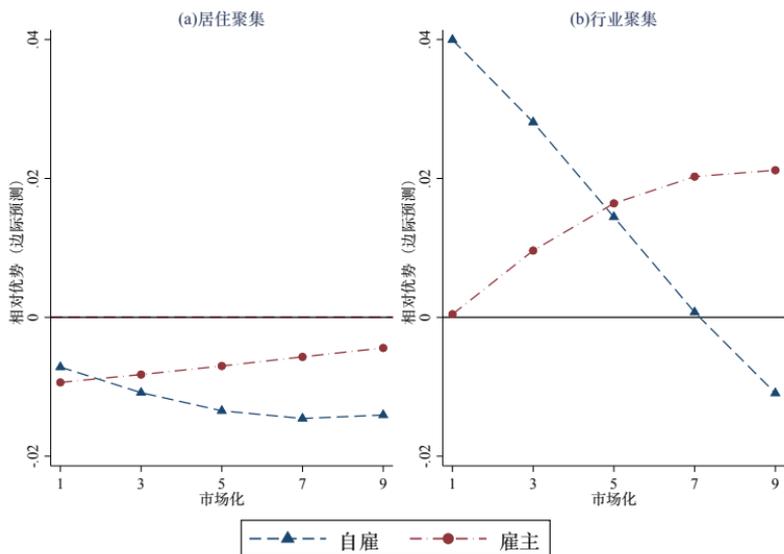


图2 市场化进程中同乡聚集效应的变化趋势

五、结论与启示

同乡聚集以及由此凝结的人际网络资源是农民工初始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工创业实践发挥着巨大作用。尽管有大量研究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角度考察了农民工创业活动，但这些研究鲜有关注同乡聚集作用的差异化特征及其动态演变过程。本研究借鉴社会网络理论资源，利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在克服样本选择性偏误之后采用两层

次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识别出不同状态的同乡聚集在农民工多元创业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差异化效应，以及这些效应是如何随市场化进程而动态演变的。研究结论具体为：

首先，居住聚集与行业聚集有着截然相反的形成逻辑，对农民工创业机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别。同乡之间的居住聚集并未给农民工带来创业优势，但行业聚集却明显增加了农民工的创业优势，特别是对规模较大、层次较高的雇主型创业的作用尤为突出。居住聚集更多的是人力资本较差、城市融入状况不佳的农民工以私人联系获取日常化同乡支持的重要手段，是市场能力赢弱者的联合；行业聚集更多是人力资本较高、城市融入状况较好的农民工通过同乡网络形成商业合作的桥梁，是市场能力较强者的结盟。前者因同乡之间交往的内卷化和同质网络的封闭性，聚集所带来的信息与资源无法应对复杂创业活动中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甚至可能会因同乡之间的欺瞒压榨、盲目攀比以及恶性竞争对创业过程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后者因职业相似性业缘聚合形成的职业团体，是从事相同行业的农民工通过价值和供应链网络，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组成的生产系统，这种商业合作网络不仅能够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识别创业机会和规避创业风险，而且创业者能够获得企业管理、发展规划等方面的经验和信息，有利于提高管理水平和制定合理的经营战略，从而大大增加创业的信心与成功率。从职业选择的角度来看，同乡之间因生活空间毗邻而形成的居住聚集，更加有利于农民工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受雇于他人，而不是选择风险系数更高的自主创业；相反，因职业相似性业缘聚合形成的同乡商业合作网络，能够有效规避创业过程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开展各类创业实践。因而，在讨论迁移者同乡聚集的经济效应时，对聚集形态与

择业过程加以区分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创业过程嵌入于制度情境之中,同乡聚集效应受制于市场环境。尽管同乡居住聚集对于农民工创业的消极作用能够在市场化进程中始终存在,但行业聚集的积极作用因创业过程与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动态演变。具体而言,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化,行业聚集对自雇型创业的影响在逐渐削弱,但对雇主型创业的影响在逐步加强。换言之,市场机制消解了小规模创业的行业聚集效应,却强化了高质量创业的行业聚集效应。这表明,城乡空间的转换并没有切断农民工与家乡原初网络的关联,以血缘、亲缘和地缘聚合形成的行业组织以及商业合作网络,依然能够有效内嵌于市场体系之中并持续发挥强劲作用。只是,因同乡聚集的状态以及创业过程不同,乡土社会资本的经济价值在市场化变迁过程中存在异质分化的情况。

中国农村传统的乡土网络对于农民工创业实践的影响不容忽视。在中国社会关系主义的文化环境中,创业者常常通过强纽带、高信任的熟人网络捕捉可靠商机、获取稀缺资金、招揽优秀人才、引入先进技术以及应对经营危机(边燕杰、杨洋,2019)。无论是最初创业机会的识别还是日后创业经营的维持,创业行为始终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不过,随着非制度化机制的松动和制度化机制的生成,创业过程中资源配置的秩序发生了新的变化。本文尝试厘清了市场化进程中同乡聚集对创业影响的差异化效应及其变迁趋势。这些经验发现,对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引导农民工高质量创业、激发农村创新活力、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体系从封闭的乡土网络向多元开放网络的转换是

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在中国市场化与城镇化并进的过程中，农民工如何借助乡土网络资源与市场化路径充分地融入“新型城镇化”，依然是社会各界需要考量的重要问题。结合本文研究发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同乡间日常化居住聚集而产生的区隔性融入对农民工的创业过程发挥抑制作用，而同乡商业组织形成的广泛业缘联系，依然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因此，政府加强对城市农民工聚居地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积极参与提升和培育外来务工人员的本土业缘关系和职业团体网络的建设，将有助于引导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参与创新、创业活动，从而激发农村各阶层的创业热情并大幅提升农民工的创业质量。

参考文献

- 边燕杰、杨洋（2019）. 中国大众创业的核心元素——创业者的关系嵌入与核心关系圈. 探索与争鸣, (9), 158-168+200.
- 边燕杰、张文宏（2001）. 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 中国社会科学, (2), 77-89.
- 陈黎（2010）. 外来工社会排斥感探析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 社会, (4), 163-178.
- 陈强（2014）. 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 应用（第二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陈瑛（2019）. 同乡聚集对沿边少数民族外出务工的影响：收入水平与地位获得. 中国人口科学, (2), 87-98.
- 狄金华、周敏（2016）. 族裔聚居区的经济与社会——对聚居区族裔经济理论的检视与反思. 社会学研究, (4), 193-217.
- 董静、赵策（2019）. 家庭支持对农民创业动机的影响研究——兼论人缘关系的替代作用. 中国人口科学, (1), 61-75.
- 胡金焱、张博（2014）. 社会网络、民间融资与家庭创业——基于中国城乡差异的实证分析. 金融研究, (10), 148-163.
- 李培林（1996）.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 社会学研究, (4), 42-52.
- 李颖晖（2020）. 强关系主导与双重资源获取：青年群体创业过程中的社会网络使用分析. 中国青年研究, (7), 96-104.
- 刘林平（2001）. 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 中国社会科学, (5), 112-124.
- 刘启超（2020）. 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同乡聚居的影响研究. 经济科学, (2), 101-115.

- 刘小童、李录堂、薛继亮（2018）.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进入路径中的社会网络分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12-21.
- 柳建坤、何晓斌、张云亮（2020）. 农户创业何以成功? ——基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双重视角的实证研究. 社会学评论, (3), 105-117.
- 陆铭、张爽、佐藤宏（2010）. 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资本还能够充当保险机制吗? ——中国农村家庭灾后消费的经验研究. 世界经济文汇, (1), 16-38.
- 斯晓夫、王颂、傅颖（2016）. 创业机会从何而来: 发现, 构建还是发现+构建? ——创业机会的理论前沿研究. 管理世界, (3), 115-127.
- 谭同学（2012）. 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新化数码快印业研究. 开放时代, (6), 69-81.
- 汪国华（2019）. 从内卷化到外延化: 新生代农民工务工地创业社会支持网络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 (8), 56-61.
- 王春超、王聪（2016）. 市场化、社会网络与城市农民工地缘集聚.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 44-56.
- 王春光（2000）. 流动中的社会网络: 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 社会学研究, (3), 109-123.
- 王建（2018）. 同乡庇护、时空约束与农民工心理健康. 青年研究, (4), 46-56+95.
- 王晶（2013）. 农村市场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机制. 社会学研究, (3), 119-144+244.
- 王文彬、赵延东（2012）. 自雇过程的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 (3), 78-97.
- 魏万青、高伟（2019）. 同乡网络的另一幅脸孔: 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劳工个体权益的影响. 社会, (2), 160-185.
- 魏万青（2016）. 自选择、职业发展与农民工同乡聚集的收入效应研究.

- 社会学研究, (5), 164-188+244-245.
- 项飙(2000). 跨越边界的社区: 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叶静怡、王琼(2013). 农民工的自雇佣选择及其收入. 财经研究, (1), 93-102.
- 张春泥、谢宇(2013). 同乡的力量: 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 社会, (1), 113-135.
- 张爽、陆铭、章元(2007). 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 ——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季刊), (2), 539-560.
- 张顺、程诚(2012). 市场化改革与社会网络资本的收入效应. 社会学研究, (1), 130-151+244-245.
- 赵佳佳、魏娟、刘军弟、刘天军(2020). 信任有助于提升创业绩效吗? ——基于876个农民创业者的理论探讨与实证检验. 中国农村观察, (4), 90-108.
- 郑莉(2014). 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以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为例. 开放时代, (1), 210-223+9.
- 庄晋财、芮正云、曾纪芬(2014). 双重网络嵌入、创业资源获取对农民工创业能力的影响——基于赣、皖、苏183个农民工创业样本的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 (3), 29-41.
- Bian, Y.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6-385.
- Bonacich, E. (1987). “Making it” in America: A social evaluation of the ethics of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0(4), 446-466.

- Guo, S., & Fraser, M. W. (2014). *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Vol. 11). SAGE publications.
- Guthrie, D. (1998).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guanxi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54, 254-282.
- Portes, A., & Zhou, M. (1993).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0(1), 74-96.
- Xie, Y., & Gough, M. (2011). Ethnic enclaves and the earnings of immigrants. *Demography*, 48(4), 1293-1315.
- Zhang, C., & Xie, Y. (2013). Place of origin and labour market outcomes among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Urban Studies*, 50(14), 3011-3026.
- Zhou, M. (1997). Segmented assimilation: Issues, controversies, and recent research on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1(4), 975-1008.